

# 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

宋新潮

(国家文物局)

## 目次

- 一、序论
- 二、中原地区发现的商代铜镜
- 三、中原地区发现的西周铜镜
- 四、商周时期中原以外青铜文化出土的铜镜
- 五、中国铜镜起源问题
- 六、余论

## 一、序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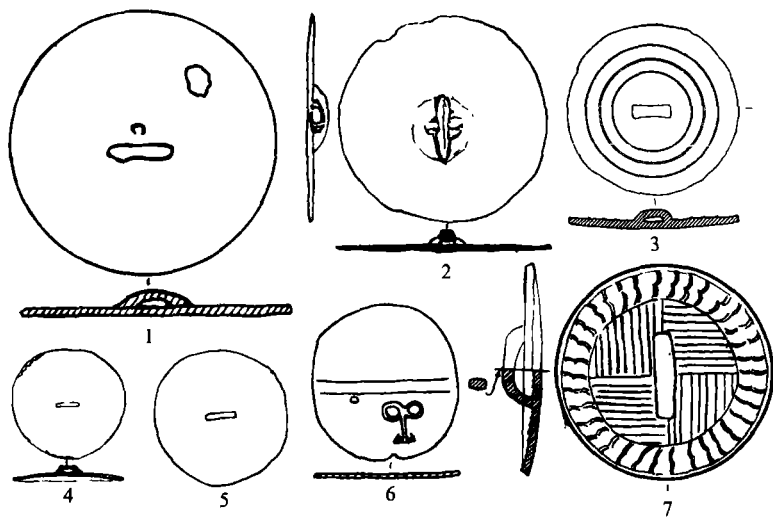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着淮河流域寿县一带和洛阳金村古墓汉以前古镜的发现和流传,对于中国早期铜镜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然而,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末,人们对中国早期铜镜的认识还局限在战国时期,故而称之为“战国镜”、“秦镜”或者“先汉镜”等。对于战国以前中国古镜的认识,则有赖于1956年上村岭虢国墓地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上村岭虢国墓地234座墓葬,共出土铜镜4面,墓地年代约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sup>[1]</sup>。殷墟妇好墓也出土四面铜镜。该墓属殷代武丁王妃妇好的陵墓,绝对年代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sup>[2]</sup>。这一发现使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中国铜镜的出现年代最晚是在商代后期。近十几年来,各地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并发表了一批年代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古镜,而且它们大都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这为我们进一步对中国早期铜镜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本文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期铜镜以及部分传世资料,对春秋以前中国境内出土的铜镜进行分类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铜镜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二、中原地区发现的商代铜镜

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镜，共计 6 面，其中四面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另外二面分别出土于侯家庄 M1005 和大司空村南地 M25<sup>[3]</sup>。六面铜镜在时代上都属于商代后期，其形制皆为圆形，镜背中央有半环形纽，纽的周围皆装饰有几何纹图案或凸弦纹。根据各面铜镜的纹饰和面积的不同，我们将其分为五式。

I 式：几何纹铜镜。1 面。此镜系 1934 年于殷墟第十次发掘中，在侯家庄西北冈 M1005 出土的。铜镜为圆形，其边缘稍向背面弯曲，镜背微内凹，镜面平滑且呈“白铜色”，镜背中央部位有半环形纽，边缘有一周由两圈凸弦纹、内填排列规则的“3”字纹构成的周边带，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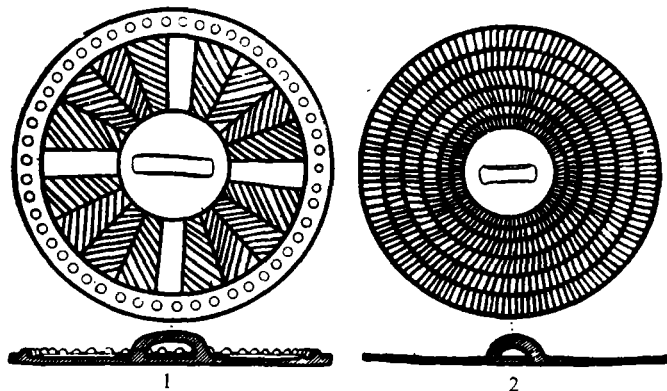
图一 中原地区商与西周青铜镜

1. 凤翔南指挥西村 M39；2. 河南浚县 M42 3. 大司空村南地 M25 4.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 M3 5. 扶风揉谷白龙村 6. 凤翔南指挥西村 M46 7. 侯家庄西北冈 M1005

边带与镜纽之间填若干条横线和竖线纹组成四等份的几何图案（图一，7）。铜镜直径 6.7、镜背直径 6.5 厘米。

II 式：几何纹铜镜。2 面。皆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圆形，镜面较为平直，背面中心有半环形纽，边缘有两道凸弦纹和若干小乳钉组成的周边带，接近镜纽处有一周凸弦纹，其与周边带之间被对称的竖线分割成四等份，内填竖线纹和斜线纹相交组成的叶脉纹。一面（原编号 786）直径 12.5、厚 0.4 厘米（图二，左）；另一面（原编号 75）直径 11.7、厚 0.2 厘米<sup>[5]</sup>。

III 式：几何纹铜镜。1 面。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原编号 45）。圆形，镜面稍凸起，背面饰凸弦纹六周，弦纹之间填以密集的竖线短道，镜背中央部位有半环形纽。直径 11.8、厚 0.2



图二 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镜

左. 7.86 右. 4.5

厘米(图二,右)<sup>[6]</sup>。

Ⅳ式:几何纹铜镜。1面。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原编号41)。圆形,正背两面都有较厚的铜锈,一侧边缘略有变形。镜背以半环形纽的内缘为中心,向外至周缘有五周凸弦纹,弦纹之间填以短斜线,组成叶脉形几何纹图案。整个图案布局与Ⅲ式相似。直径7.1、厚0.2、纽高0.4厘米<sup>[7]</sup>。

Ⅴ式:凸弦纹铜镜。1面。1986年出于大司空村南地M25,发现于腰坑附近。镜为圆形,背微内凹,镜面稍向外鼓起,背面中央有半环形纽,纽外围饰三周凸弦纹。直径7.5、厚0.3厘米(图一,3)<sup>[8]</sup>。

迄今为止,在中原地区商文化各遗址和墓葬中,所见的铜镜仅上述六面,而且这些铜镜多出土地于安阳殷墟的王室墓葬中。大司空村南地M25虽不能断定为王室或贵族墓葬,但从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礼器以及嵌有绿松石的铜柄玉矛和铜钺看,此墓也绝非一般平民茆墓<sup>[9]</sup>。殷墟出土的这六面铜镜的共同特点为圆板形,镜面平整或稍向外凸起,在镜背中央部位也都有一较为宽大的半环形桥状纽,镜纽周围饰有凸弦纹或短线组成的几何形图案,铸造工艺与殷代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等相比,显得比较粗糙,纹饰也与商代铜器纹饰有明显的差异。因此,1934年殷墟M1005所谓“镜形铜器”出土后,虽然梁思永、高去寻、梅原末治等人都认为这件“镜形铜器”就是殷代古镜,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谨慎态度<sup>[10]</sup>。以今天的知识看,殷墟M1005、殷墟妇好墓以及大司空村南地M25的铜镜,确实具备中国古镜的一般特征,属于铜镜已是铁案。但是,如果从这几面铜镜的特征,特别是纹饰特征来考察,我们似乎很难将其归入商文化铜器群中。有趣的是,这类风格的铜镜却在中原地区以外的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陕北、辽西等地相当于商代或更早的青铜文化中屡有发现,这无疑在向我们暗示着某种事实,容后详述。

### 三、中原地区发现的西周铜镜

所谓中原地区，主要指以黄河中下游及渭水流域为中心的西周文化分布区。长期以来人们对殷墟 M1005 出土的铜镜持谨慎态度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殷代与东周之间，即西周，铜镜很少发现。近十年来考古事业的发展，填补了这一空白。人们先后在陕西凤翔西村和新庄河、扶风刘家和揉谷白龙、沔西张家坡、岐山王家嘴、宝鸡市郊、甘肃崇信于家湾<sup>[11]</sup>、北京昌平白浮村、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浚县辛村等处西周墓葬和遗址，发现十余面铜镜，其形制大体可分为素面镜和纹饰镜两大类。

#### (一) 素面镜

西周到春秋初年的铜镜绝大多数属素面镜，但它们在形制上也有明显的变化或差异，可分为五式。

I 式：圆板形，镜面平整或稍向外凸起，镜背中央有半环形桥状纽。一般制作粗糙，较轻薄。目前见于发表的共七面。

1. 1979 年至 1980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凤翔县南指挥西村西周墓时，曾发现三面铜镜<sup>[12]</sup>，有两面属这一形式，其中一面（原编号 79M62：3）直径 7 厘米。根据墓内共存的青铜礼器和陶器，发掘者推测此墓属于“先周”时期。我们认为，如果从共存其它铜器风格看，将此墓年代定在商周之际可能更为恰当。另一面铜镜（原编号 79M39：2）铸造工艺粗糙，甚至镜面边缘尚有铸造时留下的砂孔，此镜直径 7.2 厘米（图一，1）。

2. 1953 年在陕西省岐山县王家嘴的一座窖穴中发现一面铜镜<sup>[13]</sup>，直径 8.7 厘米。与铜镜同出的还有涡纹鼎、夔纹鼎等青铜礼器和兵器、铜饰等，根据它们的形制分析，此窖穴的年代约当西周早期。

3. 1975 年陕西省凤翔县彪角乡新庄河村出土 1 面铜镜<sup>[14]</sup>，直径 7.22、纽长 0.8 厘米。据介绍，铜镜出土地点是一处西周初期的墓地，此前这里曾多次出土过西周初年的青铜礼器，所以报告者将此镜的年代断定在西周初期。

4. 1986 年陕西省扶风县揉谷乡白龙村村民发现一面铜镜，直径约 8.5—8.8、纽长 2 厘米<sup>[15]</sup>。从与铜镜同时发现的两件铜戈看，此镜的年代当在西周时期（图一，5）。

5. 在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中，在 M1650 木椁墓的人骨胸部发现两面铜镜<sup>[16]</sup>，形制基本相同，为圆形素面，镜面平直。这两面铜镜的直径分别为 6.4 厘米和 5.9 厘米。虢国墓地的年代约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

II 式：此式镜在形制上亦为圆形，与 I 式素面镜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镜面内凹，镜背微鼓起。镜纽与 I 式素面镜相同，为半环形桥状单纽。II 式素面镜目前仅发现三面，其中两面出土于北京昌平白浮村的两座西周墓葬<sup>[17]</sup>，另一面出土于陕西扶风黄堆西周墓（见《光明

日报》1995年10月13日2版)。白浮村的两面铜镜皆发现于墓主人头骨附近,原报告者称其为“圆镜形饰”,“疑为铜镜或器盖”。在商周铜器中有盖的容器确实不少,但类似白浮村西周墓出土的圆板形“器盖”却很少见到。此外,如果将该墓出土的青铜容器口部大小与这两件“圆镜形饰”相比较,很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器盖,而应属于铜镜。这两面铜镜的直径分别为9.5厘米(M2出土)和9.9厘米(M3出土)(图一,4)。白浮村西周墓的年代,据木椁的碳-14测定,为公元前1120±90年,即相当于西周初年。

黄堆出土的铜镜是1995年在60号西周墓中发现的,直径8.9厘米。

Ⅲ式:圆形,镜面平整,镜背中央有鼻形纽(或称为橄榄形长纽)。目前发现的仅有两面,分别出土于陕西宝鸡市郊区<sup>[8]</sup>和扶风北吕西周墓葬(《北吕周人墓地》),其铸造都比较粗糙。宝鸡市郊出土的铜镜直径6.5、厚0.22厘米;北吕(ⅠM3)出土的铜镜直径7.8、厚0.09厘米。根据与此镜同出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征,这两面铜镜的年代约在西周早期。

1932—1933年,河南省浚县辛村卫国墓地M42发现一面铜镜,现陈列于我国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所<sup>[19]</sup>。镜为圆板形,边缘较薄,中间稍厚,素面,镜纽为细长的鼻形纽。直径约为10厘米(图一,2)。对于辛村出土的这面铜镜的年代,尚存不同的看法。梅原末治先生认为此镜属于周初的遗物,郭宝钧先生根据与铜镜同出的戈、戟、斧,特别是其中的“晋季”铭戈和“成周”铭戈,断定其年代在公元前718—前700年间<sup>[20]</sup>,这一推断似乎比较妥当,即相当于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

Ⅳ式:1955年到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葬发掘时,在M178出土一面<sup>[21]</sup>。镜为圆形,镜背素面无纹,镜纽为半环形,其周围向下凹入,显得镜缘有较宽的边缘,同时也使整个镜面浮出。直径10.5厘米。与此面铜镜同出的器物还有铜鼎、铜簋以及青铜兵器等。根据这些铜礼器的特征,报告者将此墓的年代定为西周初年成王至康王时期,那么铜镜的制造年代也应在西周早期。

Ⅴ式:镜为圆形,镜面光平,镜背无纽,但有一条宽0.5厘米的凸形棱线贯通镜背中心,在棱线一侧铸有类似于文字的阳纹图案。此类铜镜,目前仅发现一面,系1979年至1980年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西村西周墓葬发掘时出土的。报告者称之为“立式铜镜”<sup>[22]</sup>,发现于木椁墓(79M46)内一长方形漆函中。直径7.1厘米(图一,6)。其年代约在西周中期。

这类铜镜形制较为特殊,是否属于铜镜,尚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去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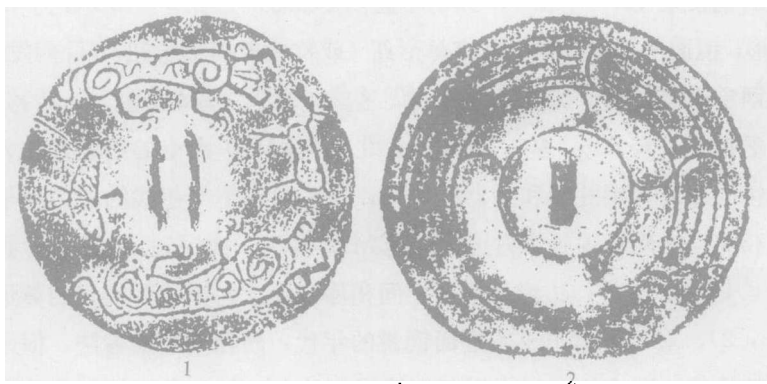
## (二) 纹饰镜

西周至春秋初年的纹饰镜,目前共发现三面。它们分别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刘家村和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根据纹饰的不同,可分为三式。

Ⅰ式:重环纹镜。镜为圆形,镜面中间部分微内凹,镜背中心有桥形单纽,在周缘处饰一周重环纹。此式镜目前仅发现一面,出土于陕西扶风刘家村的一座西周窖穴<sup>[23]</sup>。直径8厘米(图三,右)。出土时与甬钟、车辖堆放在一起。重环纹是西周晚期常见的铜器纹饰,据此

我们推断，刘家村出土的这面铜镜的年代大体在西周中晚期。

Ⅱ式：线描动物纹铜镜。镜为圆形，镜面平直，镜背中央有一个或两个半环形纽，纽的周围常饰线描的动物图案。田野考古发现的这类铜镜，在中原地区仅见一面，是 1956 年在上村岭虢国墓地 M1612 出土的<sup>[24]</sup>。镜背中心有两个半环形纽，周围分别饰有四只线描动物；双纽的左右是两只相对的虎，纽的下方为一只双翅展开的鸟，上部为一鹿。此镜直径 6.7、厚 0.35 厘米，双纽长 2.1、宽 0.45、高 0.25 厘米（图三，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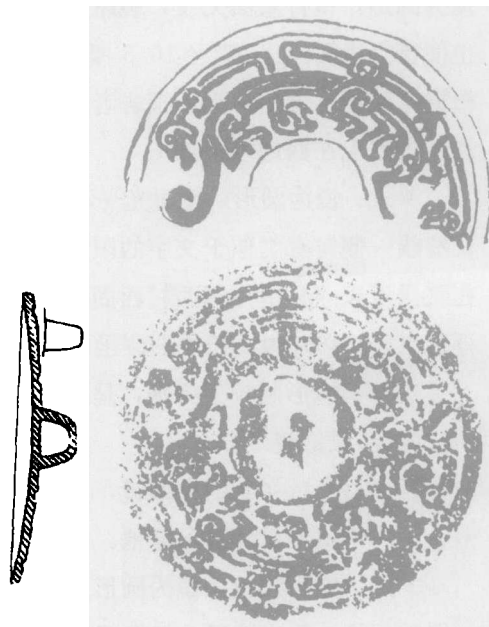


图三 西周至春秋初年纹饰镜

左. 上村岭虢国墓地 M1612 右. 扶风刘家

线描动物纹铜镜与商代几何纹铜镜以及上述重环纹铜镜，在装饰技法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线描风格的铜镜，在传世品中也有一件。据梅原末治介绍，是 1920 年 Edgar Cutmagan 从中国得到，现藏于美国耶鲁大学<sup>[25]</sup>。铜镜为圆形，镜面平直，镜背中央有一宽带状桥形纽，镜纽的周围有线描人物和动物组成的图案。其纹饰的表现方式与上村岭出土的线描动物纹镜完全相同。但由于这面铜镜的出土地点不明，我们尚不能将其归入西周纹饰镜中。

Ⅲ式：虺龙纹镜。镜面微内凹，镜背中央有一半环形桥状纽，纽的周围饰虺龙纹图案。其风格与周代铜器纹饰完全相同。这种铜镜不论是铸造工艺还是纹饰都非常精巧。此类铜镜目前也只发现一面，系出土于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墓内，原报告者称其为：“铜弧面形器”<sup>[26]</sup>。但郭宝钧等人将此器定为铜镜<sup>[27]</sup>。从这种“铜弧面形器”的形制大



图四 日本京都大学藏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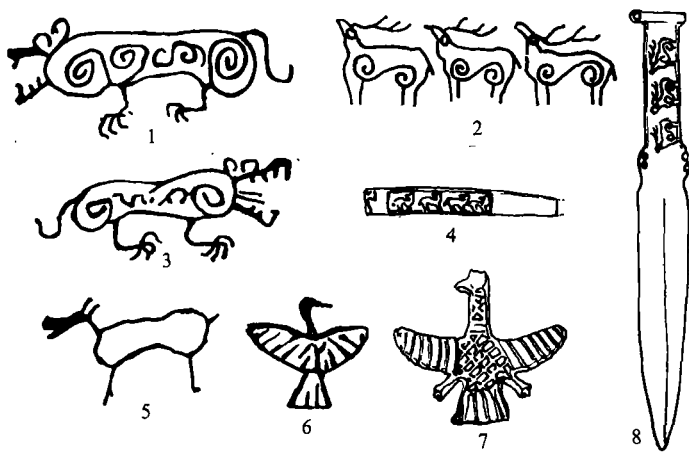
小看,将其定为铜镜是比较妥当的。此镜为圆形,镜面稍内凹,呈白铜质,镜背中央有半环形桥状纽,镜纽外围饰有两只张大嘴巴的兽(虎),兽纹之外又交叉排列了两支鸟和虺龙,属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纹饰风格。

类似的铜镜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也收藏一面<sup>[28]</sup>。据闻此镜最初是由黄浚收藏,后由梅原末治从中国带到日本。镜面色泽漆黑,铸造精良,镜面向内微凹,镜背中央有半环形纽,纽的周围饰以相对的虺龙纹(图四),与上述虢太子墓出土的铜镜非常相似,其时代也应大体相当。

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属于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即公元前九世纪初至七世纪中叶,其下限不超过公元前655年,即晋侯“假道灭虢”之时。因此,虢太子墓出土的虺龙纹镜,在年代上应在西周末到春秋初。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西周至春秋初年的铜镜与商代铜镜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在形制上,商周铜镜皆为圆板形,镜背中央有较为宽大的半环形桥状纽。在铸造工艺上,商周铜镜与同时代的其它青铜器相比显得非常粗糙,制作精良的铜镜比较少见。当然,由于时代的差别或其它原因,西周铜镜与商代铜镜也有不少差别,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代铜镜上常见各种形式的几何纹图案,在目前发现的十余面西周铜镜中则未见一例。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以几何纹为特征的铜镜在中原地区仅流行于殷商时期,它在研究中国早期铜镜中,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图五 上村岭虢国墓地铜镜纹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器纹饰比较图

1、3、5、6. 上村岭虢国墓地铜镜纹饰 4. 宁城出土的动物纹短剑 2、8. 宁城甸子乡小黑石短剑及纹饰(现藏宁城县博物馆) 7. 宁城南山根M4鸟形纹饰

第二,目前发现的西周铜镜绝大多数是素面。这种素面镜不见于中原地区商文化各遗址或墓葬。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素面镜的出现年代在西周初年。根据铜器制作的一般

规律，似乎形式简单的素面镜产生的年代，可能比工艺复杂的几何纹铜镜还要早，甘肃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素面镜，便是一例旁证<sup>[29]</sup>。

第三，西周末到春秋初期出现的线描动物纹铜镜，其纹饰的制作技法和构图风格，与同时期的周代铜器纹饰有明显差异，它与长城沿线北方草原地区的铜器纹饰风格却非常接近。如辽河上游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柄部，就常常饰有线描的动物图案（图五）。因此，樋口隆康先生曾推断，上村岭出土的线描动物纹铜镜，可能是“来自于西伯利亚”或内蒙古一带<sup>[30]</sup>。从目前已有的认识看，樋口先生的推断当非虚言。

第四，西周铜镜中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同时期青铜礼器上常见的重环纹和虺龙纹开始在铜镜上出现。它们不仅在纹饰上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纹饰完全相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也比较精良。这一现象在中国古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铜镜纹饰与整个青铜器纹饰格格不入的现象开始发生变化。

在对商代和西周铜镜分类介绍和简单比较之后，我们可以把中原地区商周铜镜的发展顺序列表一。

表一 商、西周铜镜发展顺序表

式 别		素面镜					几何纹镜					其它纹饰镜		
		I	II	III	IV	V	I	II	III	IV	V	I	II	III
商代晚期														
西周	早期													
	中期													
	晚期													
春秋早期														

#### 四、商周时期中原以外青铜文化出土的铜镜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除在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发现多面青铜镜外，在西北地区的黄河上游、北方地区的长城沿线以及新疆东部一带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也曾多次发现青铜镜。其主要地点有：青海省贵南尕马台、湟中前营村、湟源大华中庄，甘肃省广河齐家坪、平凉、漳县，陕西省淳化赵家庄，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城南山根，河北省张北，辽宁省喀左道虎沟，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巴里坤南湾、哈密焉不拉克等处。下面分三个地区加以介绍。

##### （一）黄河上游地区

##### 1. 齐家文化

甲乙甲乙考古学报 9/1: 2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可以确定属于齐家文化的铜镜有两面,分别出土于尕马台和齐家坪齐家文化的墓葬中<sup>[31]</sup>。

(1) 尕马台出土的铜镜 尕马台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在该遗址墓葬区内目前已发现四十余座齐家文化墓葬,其中在 M25 出土铜镜一面,据闻出土时被压在俯身葬的死者胸部之下。镜为圆板形,镜面平直,镜背中央原有纽,出土时已损,在纽的周围有一周凸棱形成内缘,镜背边缘也有一周凸棱,它与内缘之间饰有七角星式几何纹图案。另外,在镜的边缘处有两个小孔,推测可能是在镜纽破损后,为了系绳穿挂而设置。铜镜直径 9、厚 0.4 厘米。

(2) 齐家坪出土的铜镜 据安志敏先生介绍,这面铜镜系出土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齐家文化墓地。镜为圆板形,直径 6 厘米,镜面平整有光泽,镜背素面无纹,中央有一半环形桥状纽。关于齐家坪出土铜镜的其它情况,由于该遗址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我们还不十分了解。

齐家文化的年代,根据地层叠压关系,晚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窖文化,碳-14 测定(据 BK75010、ZK23、15、347)为公元前 2255—前 1910 年(树轮校正年代)<sup>[32]</sup>,大体与中原地区传说中的夏朝同时。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铜镜在纹饰和形制上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铜镜相似,而认为齐家文化的时代与殷代后期相当,更不能毫无根据地认为,齐家文化铜镜的“制造年代可能是纪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的殷末周初”<sup>[33]</sup>。事实上尕马台和齐家坪出土的铜镜,大体都在齐家文化的晚期,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它比中原地区殷墟出土的铜镜要早五、六百年,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镜<sup>[34]</sup>,殷墟出土的铜镜很可能来源于齐家文化。

## 2. 卡约文化

目前见于发表的卡约文化铜镜有 36 面,其中有素面镜,也有纹饰镜。

(1) 素面镜 1983 年在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发掘了 118 座卡约文化墓葬,其中约有 29% 的墓葬随葬有铜镜,共出土素面镜 34 面<sup>[35]</sup>。铜镜形制基本相同,为圆板形,镜背中央有一半环形桥状纽,镜面有微凹或平直的差别,大小也不尽相同。例如 M101 出土的铜镜,镜面平直,直径 10.5 厘米(图六,3)。M90 出土的铜镜,镜面微内凹,直径 9 厘米(图六,1)。各墓出土铜镜数量也不相等,一般一面或二面,多者六至九面。

(2) 纹饰镜 卡约文化的纹饰镜共发现一面,皆出土于青海省湟中县共和乡前营村,与铜镜共出的还有双马铜钺一件<sup>[36]</sup>。铜镜中一面为弦纹镜,圆板形,镜面平直,背面饰有三周凸弦纹,中心有半环形单纽。此镜与安阳殷墟大司空南地 M25 出土的铜镜相似<sup>[37]</sup>,直径 6、厚 0.12 厘米。另一面为几何纹镜,镜面微向外凸起,镜背中心有半环形单纽,纽外饰锯齿纹,主区饰两周弦纹,其间填以疏密有致的短直线。铜镜直径 5.5、厚 0.12 厘米。

据研究,卡约文化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后半期至商周之际,晚期约相当于西周时

期<sup>[38]</sup>。卡约文化的铜镜多出土于中、晚期的遗址或墓葬，其年代相当于商代或西周时期，它们与殷墟铜镜在年代上都晚于齐家文化的铜镜。

### 3. 其它青铜文化出土的铜镜

在西北黄河上游地区，除上面介绍的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铜镜外，还发现三面铜镜，其文化属性目前尚不清楚，但从其形制和纹饰看，也应属于商周时期。

(1) 1983 年甘肃省平凉县在废品回收站拣选出一面铜镜<sup>[39]</sup>，系圆板形，镜面微凸，镜背中央有半环形桥状纽，纽外饰双弦纹两周，其间填以规整的竖线纹。直径 6.8 厘米。报告者根据这面铜镜在纹饰上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镜（原编号 41、45）相似，认为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

(2) 陕西省淳化县文化馆曾收藏一面铜镜，系出土于该县官家乡赵家庄<sup>[40]</sup>。铜镜呈不规则的圆形，镜面平直，镜背有半环形桥状纽，纽外饰凸弦纹一周形成内缘，在接近边缘处也有一周凸弦纹，二弦纹之间的主区有距离相等的四个圆点，圆点之间填七条短直线，整个图案被圆点分割成四等分。直径 5.5 厘米。此镜构图风格与殷墟西北冈 M1005 出土的几何纹镜非常相似。根据与铜镜同时出土的两件铜鼎，报告者认为这面铜镜的年代在商末周初。

(3) 七十年末在甘肃漳县废品收购站拣选出一面铜镜<sup>[41]</sup>，圆板形，镜面平整、镜背有一较大的半环形桥状纽，纽外有二条线描蟠蛇纹，缘边有凸起的外缘。直径 6.5、厚 0.1 厘米。关于此镜的年代，原报告者根据其铜质、形制及纹饰特征推断属西周时期。我们认为，从总的风格看，可能属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更为妥当。

## (二) 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发现的铜镜

### 1. 内蒙古鄂尔多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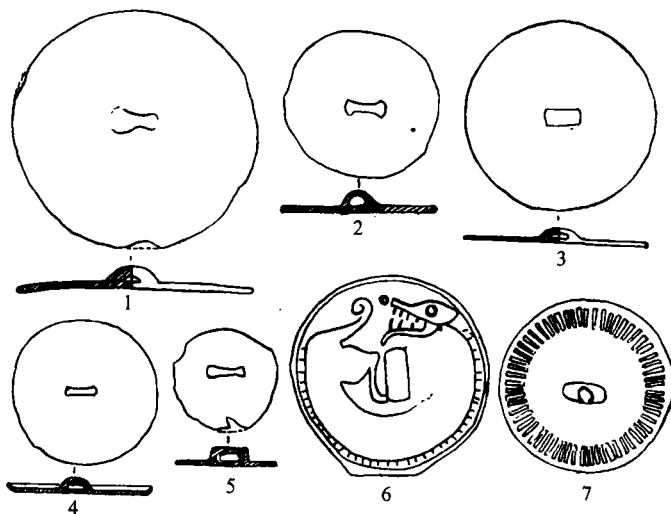
据《鄂尔多斯青铜器》一书介绍，过去曾在鄂尔多斯地区收集到五面铜镜，其中有三面（作者称为Ⅱ式镜）的时代可能相当于商周时期<sup>[42]</sup>。这三面镜皆为圆形，镜面平整，背面饰以拱形纽。一面（原编号 E·1639）镜背饰弦纹两周，弦纹之间填以密集的竖直短道，径 6.3 厘米。另一面（原编号 E·1640）镜背饰两周窄网纹带，直径 6.1 厘米。最小的一面（原编号 E·1641）直径仅 5 厘米，镜背纹饰与第一面（E·1639）相同。

上述三面铜镜的形制及纹饰特征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镜相似，因此其年代也可能比较接近。

在鄂尔多斯收集到的另外两面铜镜为素面镜，镜面平整，镜背有拱形带状纽。其中一面（原编号 E·1637）镜背有焊接的铜纽，直径 7 厘米。另一面（原编号 E·1638）略呈椭圆形，直径 6.2—6.8 厘米。这两面铜镜因缺少可断定年代的伴出物，因此，它们的年代目前尚难推断。

### 2. 河北张北

本世纪二十年代安特生曾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北县收集到一面铜镜<sup>[43]</sup>，圆板形，镜面较平，



图六 中原地区以外的早期青铜镜

1. 湟源大华中庄 M90
2. 哈密焉不拉克 M64
3. 湟源大华中庄 M101
4. 宁城南山根 M102
5. 哈密焉不拉克 M45
6. 和静察吾乎沟 4 号基地
7. 喀左山嘴子道虎沟

镜背有半环形桥状纽，纽周围有五周凸弦纹，弦纹之间填以细密的短直线。直径 6.9 厘米。张北发现的这面铜镜在形制和纹饰上都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镜（原编号 45）相同，因此，我们估计它的年代也应在商代晚期。

### 3. 宁城南山根

1963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发现两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椁墓<sup>[44]</sup>。两座墓葬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主要有戈、矛、刀、剑、马器以及青铜礼器，另外还有十一面铜镜<sup>[45]</sup>。铜镜皆为圆形素面单纽镜。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镜面平直，镜背沿稍卷或周缘呈圆形凸起，镜背中央有半环形桥状纽，如南山根 M102: 34（图六，4），出土时与铜刀一起置于死者的腰部，发掘者推测为膝间的佩戴品；另一种为凹面镜，共有八面，镜面内凹，镜背略微鼓起，中央有半环形单纽，基本上为圆形，个别略呈椭圆形。直径 10 厘米左右。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其上限可能要早到西周初年或商末周初，下限到什么时候，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宁城南山根这两座石椁墓的年代，人们的看法比较接近，认为它应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相当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到八世纪初叶或稍晚，大体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同时<sup>[46]</sup>。

### 4. 喀左道虎沟

1979 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山嘴子乡道虎沟发现铜镜一面，同出的还有铜耳环五件、玉玦、陶钵各一件<sup>[47]</sup>。镜为圆形，镜背中央有较小的半环形纽，边缘有一圈呈放射状的短竖线（图六，

7)。直径 6.1、厚 0.15 厘米。

道虎沟出土的铜耳环，为铜丝绕成，其中两件一端铸成扇面形，这种形式的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或墓葬中比较常见。至于同耳环、铜镜伴出的陶钵属魏营子类型典型器物。魏营子类型的年代根据魏营子西周早期墓葬填土中出土的该类型陶片、以及和尚沟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容器，可以推断其下限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因此，道虎沟铜镜的年代应在商末周初。

### （三）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铜镜

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铜镜大体分两类：一类为带柄镜，多出土于天山北麓、伊犁地区，这类铜镜与西亚、中亚地区发现的早期铜镜相同，应属于西亚铜镜系统，而且其年代多在春秋以后，因此这类铜镜不在本文论述之例。另一类为圆形镜，它不论在形制上，还是大小上都与中原地区发现的铜镜相似，在年代上也有不少可能早到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对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铜镜，刘学堂先生已有专文介绍<sup>[48]</sup>，本节在其基础上作简单的说明。

#### 1. 主要发现地点及形式

根据刘学堂先生的研究，新疆地区出土的铜镜在年代上可以确定早于春秋时期的主要有：和静县察吾乎沟墓群出土的五面、巴里坤南湾墓地出土的三面、焉不拉克古墓群出土的七面，共计 15 面。此外，哈密地区也发现有时代偏早的铜镜，但目前尚无详细的报道。新疆地区出土的早于春秋时期的铜镜主要为素面镜，也有个别纹饰镜。

（1）素面镜 圆形、桥形单纽，个别为矩形纽，部分铜镜背面还有纽座。此类铜镜共计十三面，它们分别是：

1957 年在焉不拉克 M22 出土三面<sup>[47]</sup>，为红铜质，圆板形，背有纽，镜面稍微凸起。直径分别为 6.11、5.7、7.8 厘米。

1986 年在发掘焉不拉克墓地时，又出土了四面铜镜<sup>[50]</sup>，其中 M64 出土一面，为圆形，素面，桥形纽。直径 6.7 厘米（图六，2）。M45 出土的一面，也为圆形，镜背素面，纽作矩形。直径 4.5 厘米（图六，5）。

巴里坤南湾墓地出土的三面铜镜<sup>[51]</sup>，为圆形，纽作弓形，有纽座。其中二面铜镜镜面平直，一面微微内凹，直径分别为 9.5、8、10.6 厘米。

察吾乎沟墓地出土三面，镜面平滑，桥形纽，其中 1 号墓地 M206 出土的一面铜镜直径 8.5 厘米<sup>[52]</sup>。

（2）纹饰镜 圆形，镜面平直，桥形纽，纽的周围有线描装饰图案。新疆地区这类铜镜目前见于报道的仅和静县察吾乎沟 4 号墓地出土的二面，分别出自 M114 和 M165<sup>[53]</sup>。铜镜图案基本相同，为一首尾相接的线描动物图案。铜镜直径均为 9.6 厘米（图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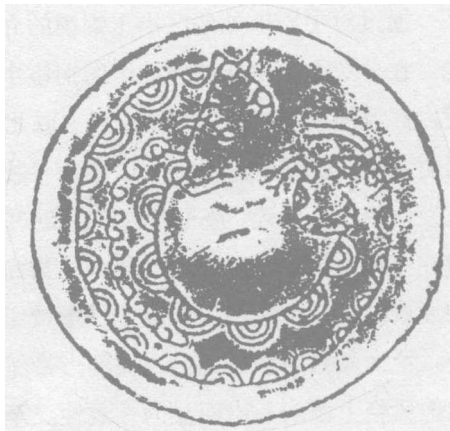
日本守屋孝藏搜集的古镜中，有一面双纽线描动物纹铜镜<sup>[54]</sup>，其纹饰风格与察吾乎沟 4 号墓地的铜镜纹饰非常相似。此镜背面周缘稍突起，中央部位有并列的双纽，在纽的周围有一只似虎的兽纹。铜镜直径 8.1 厘米（图七）。据梅原末治介绍，这面古镜大约是昭和初年从

中国带到日本的。其具体出土地点尚不清楚,从风格看这面古镜和新疆察吾乎沟出土的纹饰镜,都比较接近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青铜器的装饰传统。

## 2. 新疆地区铜镜的年代推测

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铜镜,多缺少准确的年代,因此只能根据个别墓葬或遗址的层位关系和碳-14数据加以推测。

(1)焉不拉克墓地根据地层叠压关系,报告者将其分为三期<sup>[55]</sup>。据碳-14测定,第一期四个数据中,除一个较早外(约为公元前1700年),其余三个都比较一致(公元前1300、1290、1285),即都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如果慎重些,至少应将这一期的上限定在西周初期,即不应晚于公元前1100年”。第二期,从地层叠压关系看,其相对年代应晚于第一期。然而,碳-14三个数据中有两个(M20为公元前2105年,M45为公元前1480年)都比第一期的平均数据要大,第三个数据为公元前785年(M54),可能比较接近第二期的年代。据此我们认为焉不拉克第二期的年代约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三期的情况与第二期相同,三个碳-14数据中有两个比较偏早(M47为公元前1815年,M36为公元前1715年)。另一个数据为公元前565年(M14),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比较接近事实。焉不拉克出土的铜镜主要是第一、二期的,即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



图七 日·守屋孝藏收藏的中国早期铜镜

(2)巴里坤南湾墓地共有十八个碳-14数据,均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前<sup>[56]</sup>。出土铜镜的两座墓葬,碳-14数据分别为公元前1130年(81HBKNM7)和公元前1030年(82HBNKM16),即公元前十二世纪和公元前十一世纪。因此,有人根据与铜镜共出的其它遗物推断其年代“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sup>[57]</sup>。由此可以推断,南湾墓地出土铜镜的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或商末周初。

(3)和静察吾乎沟1号墓地曾测定过十一个碳-14数据,为距今 $2825 \pm 80$ — $2525 \pm 80$ 年,即公元前875—前575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990—前625年<sup>[58]</sup>。相当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4号墓地年代范围与1号墓地大体相当,测定的十二个碳-14数据,除个别外大都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sup>[59]</sup>,2号墓地年代上晚于1、4号墓地,三个碳-14数据分别为距今 $2585 \pm 80$ 、 $2450 \pm 70$ 、 $2395 \pm 75$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695—前470年<sup>[60]</sup>。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阶段。

从上面几个墓地的碳-14数据看,新疆地区出土铜镜最早是在公元前1300—前565年前后,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个别可能要早到商代晚期或商末周初。

通过对中原以外地区出土铜镜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具有明显的几个特征。首先,在分布上,中原以外地区的铜镜主要发现于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南以及黄土高原北部和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向东到燕山以北及辽河上游地区,向西到天山南麓吐鲁番、哈密盆地。历史上这个范围一直是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其次,在年代上,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铜镜年代,最早是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铜镜。其它地区发现的铜镜在年代上都稍晚于齐家文化,约当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第三,在铜镜形制上,春秋以前中原以外地区的铜镜,皆属于圆形带纽镜,镜纽最常见的是半环形桥状纽。除少量的纹饰镜外,绝大多数为素面镜。这类圆形带纽镜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铜镜相比,不论在形制上还是纹饰风格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至于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素面镜,与中原以外地区相比几乎完全相同。这种现象不仅说明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就同其相邻的西北和北方地区存在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而且也说明中原地区的铜镜与西北和北方地区出土的铜镜应属于同一系统,其间可能还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

## 五、中国铜镜起源问题

中国铜镜是怎样产生的,它在早期社会的意义及用途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前人对此曾有过不少研究,但问题似乎仍然没有解决,还存在着许多疑惑,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加以考察。

### (一) 铜镜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况

关于中国铜镜起源问题,前人大多从古代文献资料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方法得出各自的结论。梁上椿先生就曾根据古代文献,提出中国铜镜起源于铜鉴<sup>[61]</sup>。他把古镜的源流归纳为:“止水→鉴盆中静水→无水光鉴→光面铜片→铜片背后加纽→素面镜→素地加绘彩→改绘彩加铸图文→加铸字铭。”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最大,许多学者都对此表示赞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铜镜是由阳燧演变来的<sup>[62]</sup>,也提出了一个古镜源流式:“鉴于止水,以其静也→鉴(陶先铜后)→因燧而有镜(恐非如梁上椿先生所言,因鉴而镜)”。近年来何堂坤先生又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镜由鉴来”还是“镜由阳燧来”都不能成立,因为目前考古发现中都不能证明阳燧或铜鉴出现的年代比铜镜还要早<sup>[63]</sup>。这样何先生提出铜镜应源于多种早期较为光亮的金属器,并认为铜鉴很可能出现于铜镜之后。据此他将中国古代映照方式的发展归纳为五个阶段:一、自然界的水映照;二、以盛于陶鉴中的水映照;三、大约还在陶鉴映照阶段,因铜刀、斧、指环、铜泡等光洁表面成像的启发就发明了铜镜;四、由于各种原因铜镜虽已发明,但使用未广,又才出现了铜鉴映照;五、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共存后,铜镜终于取代了陶鉴的地位,成为人们的主要映照方式。

铜镜“由鉴来”和“由燧来”的观点都存在疑窦,对此何堂坤先生已有很详尽的论述,此

不赘述。那么，铜镜是否来源于多种金属器呢？似乎也未必成立。如果说铜镜来源于早期金属器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它起源于磨光石器呢？在西亚土耳其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镜子就是黑曜石制成的，它被认为是西亚铜镜的祖形<sup>[64]</sup>。“石镜”在我国也曾有过发现。据罗振玉《辽居杂著》记载：“传世古镜有铭识者，始于秦汉，未见先秦物。然即无文字者，亦未见确可定为汉以前物者。唯往岁于定海方氏见一镜，其质介玉石间，黑光如漆，背平无纽而有穿，如古玉璫，平漫无花纹，诧为古镜中奇品，及甲子秋，予供职南斋，奉命检定御府储藏，又见一镜，形制与方氏所藏正同，光莹澄沏，明烛毫发，尤胜于方氏藏品，殆铜镜以前物，平生未见第三品也”。罗振玉所说的这两面“石镜”，其时代是否早于铜镜，甚至是否为镜，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所谓“光莹澄沏，明烛毫发”看，我们可以肯定某些磨光石器，也确有光洁如镜者。铜镜受它的启发而产生，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这里所举的磨光石器一例，并不是要证明中国铜镜起源于磨光石器，只是想说明铜镜并不一定是受某种表面光洁铜器的启发而产生。

上述有关中国铜镜起源的各家观点，虽然存在不少分歧，但是他们的基本看法应该说是是一致的。首先，各家观点都是在中国铜镜起源于“中原本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铜镜源流体系。其次，他们都认为铜镜在古代只是用于照容，这是铜镜的主要用途，也是最初的用途。因此，他们在研究铜镜起源时，都试图从文献记载中的有关古代映照方式里，寻求中国铜镜起源的答案。所以，不论是主张铜镜起源铜鉴或阳燧，还是认为铜镜起源于早期多种光亮的金属器，他们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发达的青铜文明中，铜镜技术却发展的那样缓慢？二是为什么铜镜早在商代晚期以前就已产生，而此后又发明出一个“铜鉴映照”来，难道铸造一面铜镜比铸造一件铜鉴还要复杂吗？

## （二）中国铜镜最初起源地

早在本世纪初，不少外国学者认为中国镜子来源于斯基泰文化<sup>[65]</sup>。但由于安阳殷墟商代墓葬（HPKM1005）出土有早于斯基泰文化的铜镜，这种观点在建国之前就受到高去寻等人的否定<sup>[66]</sup>。此后，几乎所有的研究铜镜的中国学者，都主张中国铜镜起源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特别是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四面铜镜的出土，这种论点似乎已成定论。但是，中国铜镜是否起源于中原地区呢？从目前考古发现的一些现象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考察。

首先，中国铜镜不是来源于西亚地区或斯基泰文化。虽然在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地的公元前2900—前2000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青铜镜<sup>[67]</sup>，但是，这些遗址出土的铜镜都是圆形带柄镜，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圆形带纽镜属于不同的系统。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带柄镜主要是在新疆地区，时代最早的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sup>[68]</sup>。因此，中国铜镜既不是来源于西亚地区，也不是受西亚铜镜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中国铜镜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铜镜最早是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出现的。据碳-14测

定, 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年代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铜镜是安阳殷墟商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 其年代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期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前期, 它与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相比, 在年代上要晚五、六百年。另外, 从统计看, 中国境内相当于商代晚期以前的铜镜, 在中原地区仅河南安阳殷墟一处(参看附表), 中原以外地区却多达七处。此外, 我们在介绍中原地区商周铜镜时发现, 不仅绝大多数商、西周铜镜在铸造技术上极为粗糙, 与同时期制作精良的其它铜器相比有明显的差别, 而且商周铜镜发现的数量较少, 这与商周时期发达的青铜文化也很不相称。更令人费解的是, 中原地区商周铜镜的纹饰风格甚至与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迥异。例如, 殷墟出土铜镜中的几何纹图案, 不见于其它商代铜器。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线描动物纹铜镜, 其纹饰风格也与同时期的铜器纹饰相去甚远。这种现象无疑在暗示着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铜镜, 有可能来自于非中原地区的事实。

最近, 刘学堂先生通过对新疆地区早期铜镜情况的介绍以及同中原地区商周铜镜的比较研究, 提出中原地区的铜镜可能是在商末周初由西域(新疆)传入的“假说”<sup>[69]</sup>。对此, 刘先生之所以称之为“假说”, 不仅说明了他的谨慎态度, 而且反映了对自己的立论依据并无把握。事实也是如此。首先, 刘先生是在撇开中间地带的情况下, 将两个相隔千里的地区文化进行简单比较, 这就很难得出接近实际的结论。通过我们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以及北方长城沿线出土的铜镜介绍, 不仅发现有数量较多、年代也较早的铜镜, 而且上述地区在地域上又恰处于中原与新疆两个自然地理面貌安全不同的地区之间。因此, 研究这两个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就必须首先对处于它们中间的地带的文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其次, 从年代上看, 新疆地区出土最早的铜镜, 是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一期的 M64 和二期 M45。这两座墓葬年代, 据碳-14 测定分别为公元前 1285 年和前 1480 年(校正年代), 其中 M45 的年代, 从地层看可能偏早<sup>[70]</sup>。而 M64 单从碳-14 数据看, 则与殷墟妇好墓年代相当。即使退一步说, 焉不拉克墓地出土的铜镜比殷墟出土的铜镜要早, 但也不能说明商文化的铜镜是来源于新疆地区。因为在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 还发现有比它们更早的铜镜, 这就是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所以,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证据之前, 假设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是由西域传来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 林沅先生在研究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之关系时, 认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镜是从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区传来的<sup>[71]</sup>, 这种看法比较接近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林沅先生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铜镜的源流, 虽然林先生在论述殷墟铜镜的来源时, 也注意到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 但他更重视所谓“北方系青铜器”中的铜镜。因此, 仅就殷墟出土的铜镜而言, 我们不排除它有可能来自于北方地区, 但是, 如果我们追溯中国铜镜的源头, 与其说它来源于中国北方等青铜文化分布区, 不如说它来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更为恰当。这不仅是考虑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年代最早, 而且从铜镜的形制和纹饰看, 齐家文化茆马台及卡约文化前营村出土的铜镜, 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镜在形制和纹饰风



格上完全相同。甚至在数量上,甘青地区出土的铜镜也远较其它地区为多。例如,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中,已发掘的118座墓葬,共出土铜镜34面<sup>[72]</sup>。这几乎比商周(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发现的铜镜总合还要多。因此,我们认为中国铜镜的最初发源地,应该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此后,铜镜首先在与甘青地区生态环境相同的今长城沿线地区得以传播,大约在商代后期开始传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向西传到天山东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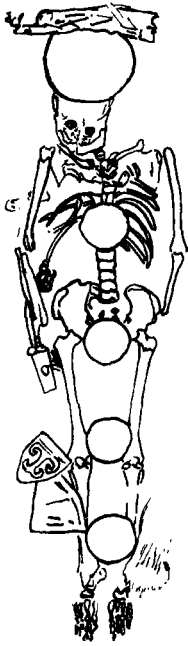
### (三) 早期铜镜用途之推测

铜镜在古代主要是人们用于照容的生活用具,对此在古代文献中有许多明确的记载。《韩非子·观行篇》就说:“古之人目短之自见,故以镜观面。”《战国策》中邹忌“朝服衣冠窥镜”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但是,铜镜是否还具有其它方面的功能和意义?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注意。根据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看,铜镜在古代社会除用于照容外,可能还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

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铜镜多出土于墓葬,而且其位置明确者又多放置在墓主人身上或附近。例如,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发现的铜镜,出土时就是压在俯身葬的墓主人胸下,可能是作为死者胸前佩饰而随葬的<sup>[73]</sup>。安阳大司空村南地M25出土的铜镜,也是发现于墓主人身下的腰坑附近<sup>[74]</sup>。宁城南山根M102石椁墓发现的铜镜,据发掘者介绍,出土时与铜刀一起置于墓主人的腰间,因此人们推测,它很可能是墓主人胸前或腰间的佩带物<sup>[75]</sup>。更有趣的是,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发现的一座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五面铜镜,从头到脚一字排列在墓主人身上(图八)<sup>[76]</sup>。这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代民族调查的资料看,在北亚、东北亚地区信仰原始多神教的民族中,铜镜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巫师作法时最重要的法器,被视为“神镜”,认为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具有避邪秽、照妖魔、医治疾病等作用<sup>[77]</sup>。根据民族调查中所见巫师的神衣看,其上所佩带的“神镜”多达十几面,甚至六、七十面。一般最大的披戴在前心窝处,为护心镜,表示太阳,稍小的挂在后背,代表月亮,寓意“怀日背月”。其它部位佩带的小铜镜,则代表了天上的众多星辰。有此传说的民族认为,星体是天上诸神用石磨出的神镜,抛到天宇中而形成日月星辰,巫师全身披饰便代表了整个宇宙的星体。可见铜镜在其中的地位。

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中,铜镜被普遍认为具有避邪消灾的作用。例如汉代铜镜铭文中就常见“去不祥”、“辟不祥”、“避去不祥”的辞句。由于对铜镜的迷信,人们还常常用镜子来预卜吉凶,文献中称为“镜听”。“镜听”起源于何时,今天已无法得知,但从一些资料看,早在唐代以前就已非常普遍。唐代大诗人王建的《镜听词》,就是写一个贫家妇女凭“镜听”来占卜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归期和吉凶(《全唐诗》卷二九八)。古人对镜子的崇拜,在今天的一些民俗中也还有遗留,例如在我国北方的许多地区,人们常常在自家的大门上镶嵌或悬挂一面明镜,据说它可以“避邪驱鬼”。



图八 沈阳郑家洼子 M6512  
出土铜镜位置图

古代道士对镜子的魔力更是笃信不疑。魏晋时葛洪在《抱朴子·登涉篇》中就说：“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人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以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当顾视镜中。其中仙人及山中的好神者。顾镜中的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于镜中也。”隋人王度的《古镜记》也记述了自己曾于汾阳人侯生处得到一面神镜，持此镜“则百邪远人”。这些说法显然十分荒诞，但它却反映了古代人对镜子的迷信。

古代的人们之所以产生对铜镜的崇拜，这当然与铜镜本身具有发光发亮的特点密切相关。铜镜明亮发光，能映照万物，再加之铜镜表面的凸凹差别，可将同一物体映照成不同的图像，这就更使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对铜镜的崇拜也与古人对日月的崇拜有关。《说文解字》说：“镜，景也。”“景”字的意思许慎则解释为“景，日光也。”可见“镜”这个名称在汉代以前就已与“日光”有关，当时的铜镜铭之中也就常见“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辞句。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古代社会，铜镜不仅具有照容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而且越是在早期社会，它的宗教意义可能越为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铜镜最早是产生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此后首先在这一地区和今长城沿线地区得以传播。在当时，铜镜除用于照容外，还具有宗教方面的用途，或许是更主要的用途。大约在商代后期，铜镜开始传入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然而直到西周时期，铜镜在中原地区还是作为“舶来品”仅为个别贵族所持有。虽然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饰以周代铜器纹饰的个别铜镜，但许多铜镜依然保留有传统的北方青铜文化的装饰风格。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的迁徙，以及中原诸侯向外“拓疆”，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铜镜也大体从这时起开始在中原地区得以普遍流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铜镜最早是产生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此后首先在这一地区和今长城沿线地区得以传播。在当时，铜镜除用于照容外，还具有宗教方面的用途，或许是更主要的用途。大约在商代后期，铜镜开始传入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然而直到西周时期，铜镜在中原地区还是作为“舶来品”仅为个别贵族所持有。虽然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饰以周代铜器纹饰的个别铜镜，但许多铜镜依然保留有传统的北方青铜文化的装饰风格。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的迁徙，以及中原诸侯向外“拓疆”，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铜镜也大体从这时起开始在中原地区得以普遍流传。

## 六、余 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铜镜虽然早在商代晚期就已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但一直到春秋以前却未能得以广泛的传播。如果我们仅仅把它视为日常生活中照容的用具的话，这种现象则是非常难于理解的。从目前发现的商代和西周铜镜看，绝大多数可能是通过某种方

式直接来源于西北或北方地区的古代民族。具有中原铜器纹饰风格的铜镜,是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年才开始出现,目前发现的仅三例,即陕西省扶风县刘家村出土的重环纹镜,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的双兽虺龙纹镜和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一面传世的虺龙纹镜。这三面铜镜不仅纹饰风格与同时期的中原铜器纹饰完全相同,而且铸造技术也比较精良,特别是其中的虺龙纹镜。它们在形制上皆属凹面镜,即中国古代的阳燧。这类凹面镜虽然最早在北京市昌平区白浮村和陕西省扶风县黄堆西周墓葬中就有发现,但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肯定它们就是中原地区生产的。在早期铜镜中,这种被称为阳燧的凹面镜,可能是最早被中原民族所接受的形式,而且在西周晚期就开始铸造饰以中原铜器纹饰的凹面镜。那么,阳燧在当时是做什么用呢?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周礼·秋官》曰:“以夫遂(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烛,共明水。”《古今注》云:“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得火也。”可见,用打磨光亮的凹面镜在日光下聚光取火,而供祭祀之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阳燧与早期铜镜仅仅是同一物体的不同形式而已,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铜镜与铜鉴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联系呢?从文献记载看,中原地区的古代民族确实存在过以水照容的阶段。《尚书·酒诰》有:“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国语·吴语》曰:“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商周文字中“监”字的造型,就“像人立于水盆视之形”。因此,郭沫若先生曾说:“古人以水为鉴,即以盆盛水而照容,此种水盆即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作鉴”<sup>[78]</sup>。此外,在文献中“镜”又被称为“鉴”。如《周礼·考工记》有“金锡半,谓之鉴燧之剂”。郑注:“鉴亦镜也。”《庄子·德充符》亦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这里“鉴”也当训为“镜”。据此前人在研究中国铜镜的起源时,无一不把铜镜与铜鉴联系起来,即使个别学者不赞成“镜由鉴来”的观点,但在其论述铜镜发展阶段时,还是提出:“由于各种原因,铜镜虽已发明,但使用未广,又才出现铜鉴映照”<sup>[79]</sup>。实际上,“以水鉴容”是中原民族传统的映照方式,在铜镜发明并传入中原地区后,这种“舶来品”并没有对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以水鉴容”的传统方式也就一直没有改变。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民族迁徙以及诸民族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再加之社会动荡变革,中原地区商周传统礼乐制度也遭到了冲击。在这种外界条件下,铜镜开始在中原地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照容用物。这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说明。

在形制上,战国中期以后铜镜的形体增大,一般直径为十余厘米,铜镜形制绝大多数为圆形,但也有少数方形铜镜。在铸造质量上,战国时期的铜镜质量明显提高,镜背纹饰精致,其特点主要流行中原铜器纹饰,有虺龙纹、饕餮纹、兽兽纹、羽状纹、涡形纹等,个别铜镜还用金银错出各种生动、复杂的花纹。由于铜镜主要成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社会需求增加,许多铜镜在铸造时采取“同范”制作,开后世“同范镜”铸造的先例<sup>[80]</sup>。此外,战国时期各

地所铸造的铜镜开始出现不同的地方特色，这不仅反映了铜镜的普遍流传，而且说明铜镜制作在当时受到特别的重视。对此，李学勤先生的《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已有详尽研究，此不赘述。总之，战国时期由于铜镜的作用主要成为人们生活日用品，因此，其分布地域、发现数量、种类和形制，都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而且也逐渐代替了传统的“以水鉴容”的映像形式。但是，“因为铜鉴映照的广泛使用，以及它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影响，才造成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许多场合中都把镜称作了鉴的现象，即把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名称，加冠到另一不太熟悉的，或晚出现的同类事物上”<sup>[65]</sup>。铜镜与铜鉴的关系也当如此。

附表 中国境内早期铜镜统计表

	出土地点	数量	资料出处	时代	备注
1	安阳殷墟	6	《殷墟妇好墓》、《考古》89.7、 《史语所集刊》29本下	商代晚期	
2	凤翔西村	3	《考古与文物》82.4	西周	
3	凤翔新庄河	1	《文物》79.12	西周	
4	宝鸡市郊	1	《文物》79.12	西周	
5	扶风刘家	1	《考古与文物》80.4	西周	
6	扶风白龙	1	《考古与文物》93.3	西周	
7	扶风北吕	1	《北吕周人墓地》	西周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8	扶风黄堆	1	《光明日报》1995.10.13	西周	
9	岐山王家嘴	1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一册	西周	
10	长安张家坡	1	《沔西发掘报告》	西周	
11	崇信于家湾	2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西周	铜镜数目据发掘人讲
12	昌平白浮村	2	《考古》76.4	西周	
13	三门峡上村岭	4	《上村岭虢国墓地》	西周末春秋初	
14	浚县辛村	1	《浚县辛村》	西周末春秋初	图见《东方学》三十五辑
15	贵南杂马台	1	《考古学报》81.3	约相当于夏代	齐家文化晚期
16	广河齐家坪	1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约相当于夏代	齐家文化晚期
17	潼中前营村	2	《文物》92.2	约相当于商代	卡约文化早期
18	潼源大华中庄	34	《考古与文物》85.5	约相当于西周	卡约文化中晚期
19	甘肃平凉	1	《文物》91.5	约相当于商代	拣选
20	甘肃漳县	1	《文物》94.11	约相当于西周	拣选
21	内蒙鄂尔多斯	3?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约相当于商代	具体地点不明
22	淳化赵家庄	1	《考古与文物》86.5	约相当于商代	
23	河北张北	1	《MFEAB》NO.4, 1932	约相当于商代	
24	宁城南山根	11	《考古学报》73.2 《考古》81.4	西周末春秋初	夏家店上层文化
25	喀左道虎沟	1	《考古学文化论集》2	约相当于商代	魏家营子类型
26	和静察吾乎沟	5	《新疆文物》93.1	约相当西周至春秋	
27	巴里坤南湾	3	《新疆文物》93.1	约相当于西周	
28	哈密焉不拉克	7	《新疆文物》93.1	约相当于西周	红铜质三面

## 注 释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 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庆祝赵元任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
- [4] 同[3]。
- [5] 同[2]。
- [6] 同[2]。
- [7] 同[2]。
- [8] 同[3]。
- [9] 据杨锡璋、杨宝成两位先生的研究,青铜钺是古代贵族身分的标志,也是军事统帅权力的象征。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0]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樋口隆康:《春秋镜的设定》,《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东方论集》,1972年。
- [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关于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出土铜镜的数量及形制,尚未见详细报告。
- [12] 韩伟等:《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144,文字解说21—22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 [14] 王永光等:《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12期。
- [15] 高西省:《扶风出土的几组商周青铜兵器》,《考古与文物》1993年3期。
- [16] 同[1]。
- [17]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
- [18] 同[14]。
- [19] 梅原末治:《中国殷周の古镜》,《史林》四二,4,1959年。
-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 [2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62年。报告编写者将此面铜镜称为“器盖”。
- [22] 同[12]。
- [23]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 [24] 同[1]。
- [25] 同[19]。又见《周代の古镜》,《东方学》三十五辑,1968年。
- [26] 同[1]。
- [27]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7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8] 同[19]、[25]。
- [29]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62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 [30] 樋口隆康:《古镜》,新潮社,1979年。
- [31] 同[29]。又见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
- [32]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考古》,《考古》1979年5期。

- [33] 李亨求:《铜镜的源流——中国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省)1981年一卷。
- [34] 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性鉴定——快中子放射化分析法》,《考古》1980年4期(铜镜含锡量约占10%,已属青铜)。
- [35] 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 [36] 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和铜镜》,《文物》1992年2期。
- [37] 同[3]大司空村条。
- [38]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 [39] 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1991年1期。
- [40]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
- [41] 姚俊峰:《甘肃漳县发现的蟠蛇纹铜镜》,《文物》1994年11期。
- [42] 田广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 [43] J. G. Andersson,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MFEAB, NO. 4. 1932.*
- [4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4期。
- [45] 南山根出土的11面铜镜中,有8面原报告称为“盖形器”。
- [46] 同[44]。
- [47] 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 [48] 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铜镜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1993年1期。
- [49]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
- [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3期。
- [51] 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新疆文物》1985年1期;贺新:《巴里坤南湾M16号墓清理简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16期。
- [52] 关于这三面铜镜的情况,参见《新疆文物》1993年1期刘学堂文。
- [5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静察吾乎沟四号墓地1987年度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4期。
- [54] 梅原末治:《周代の古鏡》,《东方学》三十五辑,1968年。
- [55] 同[50]。
- [56] 同[48]。
- [57] 同[51]贺新条。
-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和静察吾乎沟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1期。
- [59] 同[53]。
-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和静察吾乎沟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2期。
- [61] 梁上椿:《古鏡研究总论》,《大陆杂志》第五卷第五期。
- [62] 岳慎礼:《青铜鏡探源》,《大陆杂志》第十七卷第五期,1958年。
- [63] 何堂坤:《铜鏡起源初探》,《考古》1988年2期。
- [64] 同[30]。
- [65] 梅原末治:《汉以前の古鏡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5年。
- [66] 高去寻:《评汉以前的古鏡之研究并论准式之时代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9年。
- [67] 同[30]。
- [68] 同[48]。
- [69] 同[48]。
- [70] 同[50]。

- [71] 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72] 同 [35]。  
[73] 同 [31] 安志敏条。  
[74] 同 [3] 大司空村条。  
[75] 同 [44]。  
[76] 沈阳故宫博物馆等:《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1期。  
[77] 何秋涛 [清]:《朔方备乘》卷四五。  
[78] 郭沫若:《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  
[79] 同 [63]。  
[80]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铜镜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81] 同 [63]。

## EARLY CHINESE BRONZE MIRRORS AND RELATED PROBLEMS

*by*

Song Xinchao

According to the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periodization studies of the pre-Spring-and-Autumn bronze mirrors discovered so far in China,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was at c. 2000 BC in the Gansu and Qin Hai region of the upper Huanghe River valley; after that they were spread across this area and along the present-day Great Wall. Fiel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ethnographic data and ancient textual records combine to indicate that in ancient times, the bronze mirror functioned as a reflector of images and also as a religious object, especially in early society. Although bronze mirrors began to be spread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Huanghe valley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they were very ra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befor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phenomenon must have had close relation to the use and function of the bronze mirror in the then society. Beside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of the bronze mirror with the bronze water-container and sunlight igniter.

责任编辑:温明荣